

唐宋诗歌“岭南”文学书写及其嬗变

王永莉¹ 刘立荣²¹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5;

2.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唐诗中的岭南以恶劣荒远与异域风情著称, 宋代岭南诗的主体基调与唐代并无本质区别, 但环境恶劣程度明显降低。宋代诗人的岭南文学书写呈现好转趋势, 其岭南文化感知也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倾向, 这是岭南与江南气候差距逐渐缩小、岭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直接体认者增加、共同体内部成员增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岭南诗歌 环境感知 文学书写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6-0043-07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西方地理学者开始强调“通过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及其空间感、地方感了解世界”^{[1]109}。文学作品因为其反映“人”在环境认知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优势, 日渐成为地理学者理解人地关系、透视世界的有效窗口。沃森极力推崇诗歌的作用, “它是引导地理学者在思维的领地上进行度量的基本知识……所有的态度、目标、感情和幻想, 我们的美德或丑恶, 都在其灵魂中有一席之地。”^{[1]111}可见, 文学之于地理学的重要意义, 正在于它反映了文学家对景观、环境与地域社会的文化感知与文学书写。在此以人本主义地理学理论为理论依据关注唐宋岭南诗歌, 以唐宋诗歌“岭南”意象及其嬗变为切入点, 通过解读唐宋诗人对岭南景观、环境的感知、书写及其变迁, 借以再现唐宋时期岭南地域社会的真实面貌, 以就教于前贤方家。

一、唐诗“岭南”文学书写

岭南即五岭以南, 地理范围包括今天我国的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与越南人民共和国北部, 唐代在此设置岭南道, 下辖广、桂、邕、容等 73 州。在众多唐代中原诗人眼中, “岭南”无疑是环境恶劣、遥远荒凉、蛮夷遍布的代名词。在唐诗“岭南”文学书写中, 最常见的莫过于“瘴疠”“万里”“鬼门关”“魑魅”等文学意象。

(一) 恶劣荒远: “处处山川同瘴疠”

对大多数唐代诗人而言, 岭南环境恶劣荒远早已成为“共识”, “瘴”意象的营造和使用在唐诗中随处可见。如宋之问《入泷州江》诗曰: “夜杂蛟螭寝, 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 山热火云生……地偏多育蛊, 风恶好相鲸。”^{[2]651}完全一幅瘴疠遍布、毒虫出没的异域图景。沈佺期则极言驩州环境之恶劣, “疴瘴因兹苦, 穷愁益复迷。火云蒸毒雾, 阴雨濯阴霓”^{[2]1051}, 似乎比宋之问笔下的泷州更令人恐惧。柳宗元《岭南江行》诗亦曰: “瘴江南去入云烟, 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 潭心日暖长

作者简介: 王永莉, 历史学博士,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人文地理与西北地域文化; 刘立荣, 历史学博士,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人文地理与中共党史。

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2]3936}“瘴江”横亘，“黄茆”满目，“象”“蛟”出没，毒虫飓风，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同样恐怖的岭南也出现在韩愈的笔下，“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依……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2]3825}从初唐到中唐一百余年，唐诗中的“岭南”始终未改瘴疠遍布、炎氛逼人、猛兽出没的恐怖面目。

炎热潮湿也是唐代中原诗人重要的岭南环境体认。在宋之问看来，入岭之人不仅要经历“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的考验，亦难逃“身经大火热”的煎熬。沈佺期亦曰“铜柱威丹徼，朱崖镇火陬。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千秋”^{[2]1050}。张均则称“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2]985}。高温多雨为毒虫、猛兽提供了滋生繁衍的温床，成为唐代岭南诗“蛟螭”“蟒蛇”“射工”“昆虫”“鳄鱼”等意象众多的地理基础。与之伴生的“魑魅魍魉”，更让唐代诗人谈之色变，诸如“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2]652}，“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2]3827}等，诉说的均是岭南环境的恶劣。

岭南的荒远也让唐代中原的诗人望而生畏，但凡言及岭南，动辄以“万里”“鸟飞”“白云”称之，充满着客居他乡一去难回的绝望。宋之问慨叹“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2]651}，沈佺期担心“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2]1043}，最让人揪心的则是杨炎所谓的“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2]1213}，其余诸如“万里投荒裔，来时不见亲”^{[2]980}“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2]5398}等诗句比比皆是，岭南的遥远不言而喻。

在唐代中原诗人看来，岭南不仅气候炎热潮湿难以忍受，无处不在的“瘴”更让人谈之色变，加之毒虫猛兽出没，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又距离中原遥远，其环境之恶劣无与伦比。《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容州北流县南三十里有鬼门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3]1192}现实存在的“鬼门关”与唐人难以适应的“瘴”，成为诗人重构岭南恶劣地理环境的绝佳喻体，凡途经容州的流配之人，莫不极力渲染其地的恶劣环境，从“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2]1050}到“山临鬼门路，城绕瘴江流”^{[2]972}，再到“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鬼门关”俨然就是岭南的代名词。

（二）异域风情：“桄榔椰叶暗蛮溪”

恶劣荒远之外，唐代中原诗人笔下的岭南亦颇具异域风情，岭梅、荔枝、椰子、槟榔、桄榔等意象尤其多见，像宋之问笔下的“春暖阴梅花，瘴回阳鸟翼”^{[2]623}与“蒨荔摇青气，桄榔翳碧苔”^{[2]651}，王昌龄眼中的“岭上梅花侵雪暗”^{[2]1451}以及许浑所谓的“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2]6121-6122}等诗，描述的都是岭南地区常见的物候意象。沈佺期对椰子树印象尤其深刻，“日南椰子树，香袅出风尘。丛生调木首，圆实槟榔身。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2]1039}

当地居民的服饰、习俗亦与中原百姓明显不同，元稹曰：“洞主参承惊豸角，岛夷安集慕霜威。黄家贼用镋刀利，白水郎行旱地稀。蜃吐朝光楼隐隐，鳌吹细浪雨霏霏。毒龙蛰骨轰雷鼓，野象埋牙斲石矶。火布垢尘须火浣，木绵温软当绵衣。桄榔面砭槟榔涩，海气常昏海日微。蛟老变为妖妇女，舶来多卖假珠玑。”^{[2]4572}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在岭南滞留近十年之久，对岭南异域文化体认更深，“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2]6146}，从服饰到物产，甚至生产方式均与中原截然不同。

虽然唐诗中不乏赞赏岭南风光的个别诗句，如韩愈笔下的桂州，“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2]3864}，以及胡曾眼中的清远峡，“乘船浮鹢下韶水，绝境方知在岭南。蒨荔雨余山自黛，蒹葭烟尽岛如蓝。旦游萧帝新松寺，夜宿嫦娥桂影潭。不为篋中书未献，便来兹地结茅庵。”^{[2]7418}但是整体而言，作为与中原、京师相对的文化符号，岭南往往是唐代诗人不愿意深入的地理文化空间，恶劣荒远难以适应，晚唐诗人陈去疾甚至宣称“莫言塞北春风少，还胜炎荒入瘴岚”^{[2]5553}。贞观年间，唐太宗曾任命山东人卢祖尚为交州牧，卢祖尚拒绝就任，声称“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3]1701}，最终触怒唐太宗而身首异处，唐代中原诗人对岭南环境的抗拒可见一斑。

二、宋诗“岭南”文学书写

两宋时期，岭南地区属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统辖。相比于京师汴京、临安的繁华，岭南依然是蛮荒落后的边远之地，是罪

臣贬谪、人流流放的重要去处。因此，宋代诗歌“岭南”意象的主体基调与唐代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瘴”、炎热、遥远与异域风情依然如故。

除个别州县以外，岭南大部仍然难逃“瘴”害。曹勋笔下的潮州“土人尚畏生炎瘴，北客闻时泪可知。”^{[4]21185}苏轼先后被贬惠州、儋州、雷州，辗转岭南多年，亦无奈地称“光荣归珮呈佳瑞，瘴疠幽居弄晚岚”^{[4]9604}。赵蕃则称“长年雨雪不到地，瘴疠惨毒愁北人”。^{[4]30862}刘攽亦曰“地温饶瘴毒，民恶半蛮家。”^{[4]7193}至于郑獬，更是将宋人对岭南瘴害的恐惧、排斥情绪抒发到极致，“毒草见人摇，雄虺大如树。二月瘴烟发，熏蒸剧甌釜”^{[4]6823}。邹浩则直言“广南东西四十州，瘴疠莫与新昭侔”^{[4]14019}，极力控诉新、昭二州瘴疠的严重。

气候炎热也是宋代中原诗人普遍的岭南环境体认，郑侠极言连州炎热，“以为烈日长道难，加兹岭外炎暑酷”^{[4]10425}；郑刚中径直称“渴暑四围如甌釜，不妨蒸得荔枝红”^{[4]19101}；李光则称“岭南气候恶，永日值三伏”^{[4]16382}，更有甚者则将岭南比作“乾坤一火坑”。毒蛇猛兽、魑魅魍魉也让他们闻之色变，“山谷藏雄虺，溪潭养鳄鱼”^{[4]5807}“溪山毒烟中人骨，水有蛟蜃陆豺虎”^{[4]5039}“魑魅非人境，蛮夷尽鸟言”^{[4]7205}“只今瘴海投闲地，魑魅为邻盗正骄”^{[4]19335}等，危险无处不在。

岭南的荒远也让宋代中原诗人望而生畏，诸如“风波行险道，万里绝人烟”^{[4]33511}“投荒万里岭南行”^{[4]4876}“回首望江南，万里心何极”^{[4]5001}之类，充满着远离中原的无奈与绝望。加上“鬼门关”的真实存在，更让人不寒而栗，陶弼曰：“朝过鬼门关，虎迹印玄室。暮过鬼门关，猿声啸苍壁。”^{[4]5001}高登亦称：“溶溶瘴雾暗朝曦，咫尺山关号鬼门”^{[4]10101}，透露的均是对岭南的极力排斥。

但是岭南的珍贵物产、异域文化也让宋代中原诗人印象深刻。梅挚宣称：“我爱昭州果，西东此擅珍。荔枝登宴美，桂子荐盘新。”^{[4]2037}苏轼不仅酷爱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4]9530}，对槟榔也情有独钟，“可疗饥怀香自吐，能消瘴疠暖如薰。”^{[4]9623}陈襄亦曰：“番禺地僻岚烟锁，万树累累产嘉果。”^{[4]5074}王禹偁声称“身落蛮夷人共惜，罪因文学自为荣。吏供版籍多鱼税，民种山田见象耕”^{[4]745}。陶弼先后任职贺州、广州，对岭南风土体验更深，“罅开蛮俗合，脊尽瘴江分”^{[4]4999}“外国衣裳盛，中原气象非”^{[4]4995}。粤地独特的饮食文化也与中原截然不同，“粤俗嗜海物，鳞介无一遗。虾蠃味已厚，况乃蟹与蜆。潮来浦屿涨，遮捕张藩篱。潮去沙满滩，拾掇盈笊箕”^{[4]6296}。

太平兴国(976—984)初年，“选人孟峦拟宾州录事参军，诣阍诉冤，坐流海岛。自是，得远地者不敢辞。”^[5]地方官员为逃避岭南任职甚至不惜逆龙鳞、悖圣听，其对岭南的恐惧、抗拒显而易见。南宋曾丰诗曰“曲江而下水多石，大庾以南山茅芽……气候太偏风土恶，今诗聊解古人嘲”^{[4]30274}，其《送广东潘帅移镇湖南》诗更宣称：“身离瘴雨脱蛮烟，自幸得归如得仙。”^{[4]30215}广东与湖南不过一岭之隔，从广东移官湖南竟然让诗人有成仙之庆幸，诗人对岭南的恐惧感、逃避感简直无以复加。更有甚者如陈瓘，遇赦自合浦返湘途中竟称“三年已绝生还望，一日天恩到海涯”^{[4]13467}，合浦俨然就是死地，毫无生还希望。

三、宋诗“岭南”文学书写之嬗变

有宋一代，岭南诗数量明显增多，诗人笔下的“岭南”意象也表现出新的文学书写倾向，尽管他们依然在渲染“岭南”的恶劣荒远与异域风情，但与唐代中原诗人相比，宋代中原诗人笔下的“岭南”环境体认明显好转。

(一)宋诗“岭南”文学书写之嬗变：“瘴雨岚烟殊气候，玉簪罗带巧溪山”

首先，虽然“瘴”意象急剧增多且呈现多样化趋势，但岭南之“瘴”给宋人带来的危害与影响却在慢慢淡化。一方面，曾令唐人无比恐惧的“瘴疠”“瘴疫”意象，逐渐向可消、可除、可停、可幽居的状态转化，类似“尽洗蛮烟瘴雨尘，药洲草木欣然春”“可疗饥怀香自吐，能消瘴疠暖如薰”之类的诗句频频出现。另一方面，不少岭南州县甚至出现无“瘴”趋势：诸如“桂林独宜人，无瘴古所传”^{[4]25876}的桂州；“海风吹断山无瘴，炎月何妨作宦游”^{[4]31336}的广州；“地灵瘴疠绝，人物倾南极”^{[4]6553}的

惠州，“两岁昭潭无瘴疠，清秋郁郁望神岗”^{[4]15840}的昭州，“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4]16016}的潮州，“东流满郭湖相似，塞气侵人瘴自无”^{[4]5003}的钦州等等，无“瘴”之州越来越多，岭南无“瘴”范围正在日益扩大，这无疑是宋代诗人“岭南”环境体认好转在文学中的体现。有学者认为，宋代文人继承了唐代诗人对岭南地理的普遍认知，如果说唐人确立了“瘴雨蛮烟”这一表现岭南地理经典意象的话，那么宋人则使其蔚为大观。换言之，就是宋人继承并强化了唐人关于岭南地理的“瘴雨蛮烟”认知。昔日唐代诗人眼中的岭南“瘴疠”“瘴疫”，正在朝宋代诗人心目中的“瘴雨”“蛮烟”转变，甚至有诗人觉得岭南环境优于中原，南宋赵蕃即曰“峤南山水佳，中州未曾有。慨然远游意，不惮万里走。”^{[4]30417}唐代诗人对岭南的恐惧、逃避之情逐渐被宋代诗人的岭南认同替代。

其次，“荔枝”“槟榔”“桃榔”“梅花”等物候意象出现频次明显增加，空间分布范围亦明显扩大。“荔枝”意象的空间分布从唐代的容、桂、连、惠、广、柳诸州扩展到两宋时期的桂、贺、钦、昭、番禺、南雄、雷、封、邕、柳、宾、容、新等州在内的岭南广大地域；“槟榔”意象则从唐代的桂州扩展到宋代的桂、广、儋、英、昭、象、贺、琼、封诸州以及万安、朱崖二军与安南都护府等地，几乎遍布岭南诸州；“桃榔”意象从唐代广义的岭南扩展至宋代的连、昭、宜、桂、广、韶、儋、惠、梧、邕等州。作为岭南异域风情的物候符号，“荔枝”“槟榔”等空间分布范围的扩大无疑代表着宋代诗人对岭南文化认同感的增强。

最后，“犀象”“蛮獠”“珍珠”等异域文化意象也逐渐为宋人所接受，范端臣曰：“一辞湖上月，三见岭南春。怪鸟呼如鬼，痴猿立似人。蛮商通海舶，渔户杂江滨。尚有鞭牛扑，纷拏起路尘”^{[4]24038}，“人望南风贾舶归，利通中国海南夷。珠珍犀象来无限，但恐青钱有尽时”^{[4]32612}，完全一派繁荣景象。

（二）宋诗“岭南”文化感知之嬗变：“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

与唐代诗人心目中的瘴疠遍布、炎热潮湿、蛮荒落后的岭南相比，宋代诗人笔下的岭南，环境明显好转，正在向物产丰富、文化繁荣的宜居之地转变，认同感大大提高。

北宋初年，成都人梅挚作《昭潭十爱》组诗，对昭州的自然胜境大加赞赏，诸如“沃野藤溪道，浮琛玉海门”^{[4]2036}“映树珠含影，承牙玉溜津”^{[4]2037}等，甚至情不自禁地发出“二年游宦乐，满腹岭南春”^{[4]2037}的感慨。永州人陶弼亦对桂州的优美景色赞不绝口，“旧策扫开浪泊雾，新诗装就桂林春。相离水色秋前老，独秀岚光霁后匀”^{[4]4996}。苏轼则极言惠州风物之美，“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4]9603}极力称道“桂花”“荔子”“黄柑”“朱橘”等岭南物产。郭祥正亦曰“舟绕苍崖转碧津，层层云树画屏新。分明便是桃源路，底事无花不见人。”^{[4]8987}李纲《容南道中》亦曰：“萧然有佳致，作个是炎荒”^{[4]17742}。杨万里《揭阳道中》则曰：“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4]26304}曾几笔下的桂州，更是“人物豪华真乐国，江山清绝胜中原”^{[4]18557}，环境、文化均已让诗人产生岭南远胜中原之感。南宋末年诗人赵汝回更称：“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端溪溪阔山无烟，长腰米白鲫鲙鲜。山媪采蕉蚕采蠶，羽檄不警徭赋蠲”^{[4]35871}，完全一派物产丰富、政通人和的盛世气象。

（三）宋诗“岭南”文学书写之不变情结：“土风惯习瘴谁虑，客况寂寥心自愁”

宋代诗人笔下的“岭南”意象，虽然出现环境好转趋势，但依然伴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绪，那就是“岭南”虽好并非故乡的文化认知。张泌《春日旅泊桂州》曰：“暖风芳草竟芊绵，多病多愁负少年。弱柳未胜寒食雨，好花争奈夕阳天。溪边物色堪图画，林畔莺声似管弦。独有离人开泪眼，强凭杯酒亦潸然”^{[4]199}，桂州自然环境虽美，却不足以使诗人忘记远离家乡亲人的惆怅思绪。无独有偶，陶弼《桂林》诗亦曰“青罗江水碧连山，城在山光水色间。尽道宜人惟桂郡，骖鸾客至只思还。”^{[4]4992}诗人先任职阳朔，又知宾、容、钦、顺诸州，对岭南环境有深刻的亲身体认，在他看来，山光水色的宜人桂林固然美不胜收，却无法改变南迁之人的思乡之情。心胸豁达的黄庭坚亦曾曰“江山信美思归去，听我劳歌亦欲东”^{[4]11538}。张洵的《蒙亭倡和长句》诗堪称个中典型，“桂林山水冠衡湘，蒙亭正在漓水傍。清流洄洑眩波光，高崖古木争苍苍。下有菱荷满横塘，面面风来

面面香。新诗一咏酒一觞，爽气浑如秋气凉。酒阑岩下踞胡床，汲泉煮茗沉烟长。从容谈笑声琅琅，水光山色增辉芒。东山兰亭各一方，风流兼追谢与王。回头尘事皆茫茫，为计不若行乐良。恨我到此情难忘，遥指白云思故乡。”^{[4]15759}虽有美景当前，依然心系故园。李运使《郁林州》亦称“土风惯习瘴谁虑，客况寂寥心自愁”^{[4]45137}，虽然早已习惯郁林州的土风习惯，瘴害亦不足为虑，然而孤处南荒的寂寞寥落与乡愁却始终挥之不去。杨万里更声称“黄茅起烟如黄沙，瘴母照永曼陀花。广东之游乐复乐，劝君不如早还家”^{[4]26290}，宦游广东虽乐趣多多，然而毕竟身在异乡，不如早日还家。李昇之《夜游漓江上》亦称：“漓江开遍四时花，游览都忘履齿赊。风景虽宜秋向老，关山无奈客思家。”^{[4]2689}赵蕃送别友人时则称“君行更过五岭南，象郡我亦闻人谈。纵令为郡真尔好，愿勿久留归要早。”^{[4]30494}

宋代诗人的这种“岭南”文学书写之不变情结，恰恰说明岭南虽美，终究只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安置罪臣、贬官的流放之地，客居之人，无论是贬谪或是流放，家园与他乡、繁华与蛮荒、中心与边缘的心理挣扎始终存在，再美的风景再多的特产，都抵不过对家园的思念、对繁华的向往、对回归政治中心的渴盼。反映在文学领域，便是优良的环境感知与恶劣的文化感知的相互交织，看似矛盾，实则统一。

四、唐宋诗歌“岭南”文学书写嬗变的动因机制

“岭南”作为唐宋诗歌中常见的诗歌意象群，其变迁当然与岭南地理景观变化、唐宋诗人的岭南环境体认变化密不可分。一方面，初唐到宋末近 660 年的漫长时间中，岭南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早已发生缓慢变化；另一方面，诗人对岭南的环境体认必然随之改变，这些都是影响唐宋诗人岭南环境感知与文学书写的重要动因机制。

（一）南北方气候差异缩小，中原人逐渐适应岭南湿热

两宋是我国古代公认的中世纪温暖期，江淮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与岭南之间的温差逐渐缩小，从身体感官上，中原人对岭南的炎热潮湿已经比较适应。正如薛爱华在《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中指出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长于文字的汉人逐渐适应了长江与湖南地区的温暖气候，这使得他们对热带的高温有所准备”^[6]。苏轼即宣称“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4]9551}，苏辙亦曰“南海炎凉身已惯”^{[4]10079}，李曾伯《桂林即事》亦称：“近来知节适，不怕瘴烟侵”^{[4]38716}。随着在岭南滞留时间的延长，中原人已逐渐适应当地气候，“瘴”对他们已不构成威胁了。据笔者统计，两宋时期，任职、游历岭南的江西、湖南、福建籍诗人达 322 人，占非岭南籍任职、游历岭南者总量的 44.7%，这些人曾长期在与岭南气候相近的环境中生活，适应岭南环境当然更加容易。

随着对岭南环境的生理性适应，两宋诗人对岭南的排斥心理也逐渐淡化，郑刚中《风俗》即曰：“岭南自岭南，勿与岭北比。况自江山情，雅故均邻里。”^{[4]19128}苏轼更曰：“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渔樵。”^{[4]9504}李纲则公开宣称：“炎荒景物随时好，何必深悲瘴疠乡”^{[4]17729}“未到江湖先到此，风流谁道在炎荒”^{[4]17749}。晁公迈更宣称“南游瘴国吾何恨，怀抱多从此地开”^{[4]21238}，在宋代诗人眼中，适应岭南气候以后，“瘴疠”“炎荒”“天涯”等问题已不在话下，与唐人的宁入塞北不下岭南相比，岭南炎热明显比塞北苦寒更容易接受，“当时已分餐毡草，宁复梦游炎岭热”^{[4]25868}。廖行之即曰：“而今五岭多宜客，见说群卿剩好贤。”^{[4]29199}李光亦曰：“朝行避烟瘴，夜宿傍城郭。剩夸鱼米贱，勿说风土恶。”^{[4]16383}曾丰亦宣称“北人落南者，久亦自相安”^{[4]30234}。更有甚者，虽日日思念家乡，却在离开岭南之际充满不舍，陈藻即曰：“两年为客忆乡关，樽酒何时别此间。今日移舟出城市，多情却恋眼中山”^{[4]31318}，言语中充满着离别岭南的惆怅。苏轼《别海南黎民表》更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4]9568}，对海南的适应、喜爱跃然纸上。

（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岭南经济渐次开发，中原文化向岭南扩展

两宋时期，随着辽、金、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中央政府政治、经济重心渐次向东、南迁移，大量人口被迫从黄河流域迁往江南甚至更南的岭南。北宋灭亡后，大量北方人口迁居南方，李纲即曰：“感慨伤春望，侨居多北人”^{[4]17748}。胡寅亦声

称“新州州土丞岚瘴，从来只是居流放。于今多住四方人，况复为官气条畅。”^{[4]20951}及至南宋末年，南迁之人更多，以至于“中州无地堪投足，垂老携家泛瘴江。”^{[4]36302}宋末元初诗人方回侨居岭南，“长官行县课农书，耕叟治田贾趁虚。上到岭头望应喜，人烟今密旧时疏。”^{[4]41668}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江南、岭南，岭南经济得到明显开发，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也渐趋发达。曾丰《广州登盖海楼》即曰“十万人烟城缭绕”^{[4]30206}，就连远在海南的海口都户口大增，“按图自古无人到，二百年来户口添。架屋上山成市井，张官近海课鱼盐”^{[4]31299}，经济繁荣一时。

随着岭南经济的渐次开发，儒家文化日益向岭南传播，岭南文教渐趋发达，从根本上改变了诗人对岭南的文化认知。潮阳通判陈尧佐对潮阳的文化氛围大加称赞，“潮阳山水东南奇，鱼盐城郭民熙熙。当时为撰玄圣碑，而今风俗邹鲁为。”^{[4]1087}“休嗟城邑住天荒，已是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边邹鲁是潮阳。”^{[4]1088}潮阳号称“海边邹鲁”，文教发达之程度可想而知。张方平亦称：“炎方景象异中原，海气昏昏杂瘴烟。今日荒夷成雅俗，薰风南播自妨弦”^{[4]3831}。李纲曾为容南郡育材堂作诗，题曰“自学校之制度而戎马之患兴，州县长民者不复以教育为意，独容南鼎新郡庠，招徕生徒，弦诵之声不辍，诚可嘉叹”，诗即曰“贤守来南纪，宏规肇泮林。飞翠开讲席，鼓篋拂书蟫”^{[4]17746}。赵汝回更曰：“党碑诸贤昔往还，人士尽识洛水源。广文下马春风前，升堂讲书鼓鼙鼙。远方朋来笈在肩，再拜愿预弟子贤。中庸大学玄又玄，商盘周诰非雕镌。灯花两檐陈俎豆，一一口说手注篇。”^{[4]35871}大批元祐党人南迁，从客观上加速了关洛学说与经学、古文字学等儒家思想文化在岭南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岭南文教的繁荣发展，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岭南的主流文化，宋代诗人对岭南文化的心理认同感大大增强。

(三)直接环境体认者增多

根据诗人的环境体认方式，唐宋诗歌“岭南”意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无岭南生活经历，其对岭南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的描述，源于对前人或时人岭南环境认知的传承与加工，是典型的间接体认者，主观色彩浓厚；另一类是诗人因贬谪、游历等原因到过岭南，其对岭南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的书写源自直接环境体认，是客观地理环境与主观文化认知的综合产物。

唐代岭南开发程度较低，入岭南之人甚少且以谪臣流犯居多，心境不佳者众，难免主观渲染岭南环境的恶劣荒远；无岭南经历者则通过对前人、时人岭南环境体认的传承与文学加工，对岭南的陌生疏离加剧了他们的恐惧感、逃避感，极言其恶劣、遥远与异域文化，故唐诗“岭南”意象以悲愁、恶劣者居多。笔者统计了唐代岭南诗 369 首，共涉及 113 位诗人，其中 59 位诗人因贬谪、流放或游历进入过岭南，他们共创作岭南诗歌 255 首，其中环境体认较差者约为 66.7%；另外 54 位诗人无岭南生活经历，他们创作的 114 首岭南诗歌中，环境体认较差者高达 73.7%。直接体认者的岭南环境认知虽然仍以恶劣不佳为主要倾向，但环境体认较差者比例明显低于间接体认者，可见直接环境体认对岭南环境体认与文学书写具有一定影响。

宋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长江流域野无闲田，大量中原人口涌入岭南，有岭南经历的诗人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全宋诗》收录诗人中至少有 259 人有被贬谪、流放或游历岭南经历，他们共创作岭南诗 1208 首，其中环境体认较差者 599 首，约占 49.6%，环境体认较佳者 609 首，约占 50.4%；很明显，宋代直接环境体认者的岭南环境体认明显优于唐代。直接环境体认者的增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代诗人的岭南文学书写。

与唐代相比，宋代诗人中有岭南直接体认者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唐宋以来“岭南”意象文学书写的本质属性。他们对岭南环境的描述开始向自然、客观方向发展，一些诗人甚至开始质疑长期以来的传统岭南认知，郭祥正更是公开为岭南环境翻案，“大庾南来山更佳，每逢古寺留柴车。曹溪衣传葛猿布，月岭树种苹婆花。千年不坏物稀有，一日寓赏心无涯。北人浪说瘴雾恶，行拥貂裘冲雪华。”^{[4]8953}秦观《宁浦书事》亦曰“鱼稻有如淮右，溪山宛类江南。自是迁臣多病，非干此地烟岚”^{[4]12118}，宁浦在今广西横县，在秦观看来，当地环境与江南淮右相似，贬谪之人身体状况不佳，主要是个人原因，与岭南烟岚无关。

(四)空间共同体内部成员增多

按照波蒂厄斯的空间认知理论，认知主体对环境/空间的认知可以按照主体相对于环境/空间的地理、心理位置分为四种：即

家园-内部者、家园-外部者、外地-内部者与外地-外部者，其中家园-外部者指那些未能与周围环境建立起内部联系的人；外地-内部者指描述经历的旅行者；外地-外部者则指那些经历着所谓无地方世界的异化的人，家园-内部者则指那些身处空间内部并且视其为家园的人。作为真正的空间共同体成员，家园-内部者对环境/空间的认知才是真正的“地方的意义”。严格意义上讲，只有那些生于岭南长于岭南的人们如唐代张九龄等笔下的“岭南”才应该是唐代时期最真实的岭南。当然，那些曾经进入岭南的诗人，因为对岭南的地理、人文环境具有亲身体认，当然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岭南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意义。

宋代尤其是南宋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东、南移，岭南经济渐次得到开发，文化亦呈现出明显的与中原文化趋同趋势，越来越多的岭南士子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濡染下，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进入中原乃至京师为官，如孟宾于、黄仲通、余靖、田开等人，他们从小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与亲切感，虽在朝为官多年，依然怀着浓烈的落叶归根情结，渴望回归家乡，孟宾于《怀连上旧居》曰：“闲思连上景难齐，树绕仙乡路绕溪。明月夜舟渔父唱，春风平野鹧鸪啼。”^{[4]34}言语中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黄仲通《惠州野吏亭》亦曰：“危亭治旧基，登览一何奇。万态罗浮景，三章宰辅诗。岚光如画处，霁色乍开时。味此休闲趣，惟予野吏知。”^{[4]1832-1833}黄仲通是余靖的舅父，韶州曲江人，北宋至和元年(1054)知惠州，其笔下的惠州，地理环境优良，岚光如画、霁色乍开，颇有奇趣，完全是发自肺腑的欣赏喜爱之情。田开笔下的临封，既不乏“岭南蕉子国，海上荔枝庄”^{[4]5055}的风情，更有“秋风三酿酒，风景四时花”^{[4]5055}的美景，竹屋渔村，江山形胜，礼义之乡，宁静而富庶，堪称“宦游仙乡”。

据统计，《全宋诗》中岭南籍诗人已多达 143 人，进士出身者至少 44 人，他们通过科举仕进等途径进入中央统治阶层，成为主流话语人群的一部分，他们对岭南环境的认同与喜爱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宋代岭南诗歌文学书写的好转。这种对家乡强烈的认同感与亲切感，随着入仕为官的岭南士子逐渐增多而迅速强化，极大地丰富了宋代诗歌对“岭南”意象的“本我”书写，这也是宋代“岭南”意象逐渐改观的重要原因。

五、结语

与唐代诗人的岭南文学书写相比，虽然宋代诗人依然在渲染“岭南”的恶劣荒远与异域风情，但他们笔下的“岭南”意象却在悄然嬗变：自然地理环境出现好转趋势，瘴害逐渐降低甚至消失，“荔枝”“梅花”“槟榔”“桃榔”等物候意象的空间分布范围明显扩大，“犀象”“蛮獠”“珍珠”等异域文化意象也逐渐为诗人所接受，一改昔日恶劣荒远、野蛮落后的文化形象。中原诗人对岭南文化的认同心理日益增强，根本原因在于：首先，宋代岭南与江南之间的年均气温、气候差异明显缩小，中原人对岭南高温湿热气候的适应性明显增强；其次，因战乱与人地矛盾突出导致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岭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中原汉文化渐次传播，诗人对岭南地区的文化认同感增强；第三，随着中央政府政治重心南移，越来越多的中原士人因贬谪、流放、入仕等原因进入岭南，直接环境体认者增多，客观真实描写岭南环境的倾向逐渐增加；最后，随着岭南文化教育水平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岭南知识分子以科举晋身，跻身主流话语人群，他们作为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环境认知，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主流话语。

参考文献：

- [1]R. J. 约翰斯顿.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 蔡运龙, 江涛,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2]彭定求, 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3]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1192.
- [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5]脱脱, 等. 宋史(简体字本)[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2491.

[6]薛爱华.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M]. 程章灿, 叶蕾蕾,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295.